

清季梁啟超的國家論 及其相關理論背景*

孫宏雲

[提要] 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受伯倫知理的國家學影響，放棄大同學說，改信“國家主義”，認為國家的實質就在於“國民”之存在，呼籲國人主動爭取自由與民權，儘快建立民族國民國家。庚子事變後，受帝國主義論的刺激，梁啟超更加意識到建立民族國民國家的迫切性，而以培養公德、塑造“新民”作為下手的辦法。旋因排滿革命運動興起，因擔心多民族的共同體因此而分崩離析，於是放棄了由“新民”而建國的思想啟蒙路線，主張實行“開明專制”，希望由此來推動立憲制國家的建立。

[關鍵詞] 梁啟超 國家 民族帝國主義 新民說 開明專制

[中圖分類號] K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2) 04 - 0177 - 13

對於梁啟超旅日後的思想變易及其“東學”背景，近十多年來學術界頗為關注，狹間直樹、鄭匡民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推進了該領域的研究進展，不過持續研究的空間依然巨大，而既有的研究成果亦非沒有可以重新檢討的餘地。即以這段時間內梁啟超的國家主義思想而言，此前已有諸多論著對其進行了論述，但是仍有不少史實盲點，相關解讀亦可商榷。小論乃以前此研究成果為基礎，儘量略人之所詳，重在申述個人所見，不當之處，亦請方家指正。

一、從大同學說到國家主義

梁啟超到日本後不久就將德國學者伯倫知理的《國家論》在《清議報》上連載。有關《國家論》的文本淵源以及梁啟超為何要有刪節地刊載部分內容，法國學者巴斯蒂已有深入細緻的研究。^①據她分析，梁啟超之所以選擇刊登伯倫知理《國家論》的譯文，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當時德

* 本研究成果得到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Program for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in University)資助。

國學派在日本頗具權威性，而伯倫知理又是該學派一位傑出的法學家。至於梁啟超刪去書中有關君主立憲制和代議共和制的分析，無疑反映了他當時在選擇最合適政治形式這個問題上的猶豫不決——一方面受康有為的壓力，表示擁護清帝；另一方面不僅同孫中山聯繫密切，而且還在積極樹立“民權”，激發自由精神。

如何解讀梁啟超在《清議報》上譯刊《國家論》之舉的思想意義，是研究梁啟超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因為關涉到梁啟超1903年訪美前後其思想的斷裂或連續性問題。在巴斯蒂此文發表之前，張朋園和張灝分別代表“斷裂”說（或稱“突變”說）和“連續”說（或稱“漸變”說），但都沒有注意到梁啟超在《清議報》上譯刊《國家論》此舉的意義。^②而巴斯蒂此文彌補了以往被研究者所忽略了的梁啟超在赴美之前與伯倫知理國家學在思想上的關聯性，對研究梁啟超1899~1903年間的政治思想來說是一大突破。自該文發表以來，又引起了較多關注，相關討論進一步展開。鄭匡民認為梁啟超雖然一定程度上受伯倫知理的學說影響，但當時他的主要興趣還是放在盧梭的學說上，認為盧梭的學說才是中國的救時良藥。伯倫知理將造成法國動盪不定、釀出法國大革命慘禍的責任歸結於盧梭的民約論，這恐怕是梁啟超未刊登《國家論》第二卷的主要原因。^③川尻文彥則認同巴斯蒂的觀點，認為梁啟超的國家思想存在著連續性。^④韓國學者李春馥通過分析赴美之前梁氏將盧梭與伯倫知理作對比的文章及其有關看法，認為梁氏國家主義思想的形成和轉變之軌跡，既是作為對盧梭民主主義理論的改動和否定的學說逐步出現的，也是作為對伯倫知理國家主義理論的贊同和認同的政治學說而逐步出現的。^⑤

上述觀點及其論證還有可以商榷與補充之處，特別是將伯倫知理和盧梭分別作為專制與民主的思想符號而加以運用，糾纏於梁啟超的思想是從民主到專制，還是從專制到專制，還是從專制到民主再到專制的線性邏輯思維。

首先關於《清議報》上刊載的《國家論》的版本與譯者問題。巴斯蒂肯定《清議報》上刊載的沒有署名譯者的《國家論》是梁啟超從1899年東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的《國家學》中節選“抄襲”而來的。這一結論雖然還不無瑕疵，但應該說距離事實最近，不過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在當時日本各派政治思想中，梁啟超為什麼首先選擇了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他又是如何得到吾妻兵治譯的《國家學》原稿、清樣或抄本的呢？要弄清這一點就有必要考查梁啟超當時與日本人的交往情況。據梁啟超自述，“日本人訂交形神俱親，誼等骨肉者數人。其餘隸友籍者數十。”^⑥有學者指出，“在此錚錚之輩中，情同手足的無疑是柏原文太郎，而與梁啟超交誼最深者則是陸羯南。”^⑦此外，善鄰譯書館、《亞東時報》以及山根虎之助、山本憲等興亞機構和興亞論者與梁啟超的關係也很值得關注。筆者目前所作的研究雖然還不足以徹底弄清圍繞著《清議報》上刊登的《國家論》的具體史實，但通過探討梁啟超當時所處的社會關係網絡及其知識思想氛圍，對於把握梁啟超的國家論應該不無裨益。這些興亞論者具有一個共同的思想特徵，就是一方面仇視與渲染歐美勢力東侵，宣揚東亞國家攜手聯合，共同進行抵抗，另一方面又以日本的明治維新樹立榜樣，鼓吹與支持中國政治革新，建立近代國民國家。在與梁啟超的交往過程中，他們的觀點對於梁啟超肯定會產生影響，梁啟超後來亦說他居東後，“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偏狹的國家主義”。^⑧

從梁啟超居東後所發表的言論來看，反映其重視國家主義的文章是發表在《清議報》第6、7、22冊（1899年2月20日、3月2日、7月28日）上的《愛國論》。在這篇文章中，梁啟超從國家強弱與愛國心有無之關係出發，指出欲國家自強必須“民智開”、“民力萃”，激發與培養國人的愛

國心“必以聯合與教育二事為之起點”。“聯合之中更為大聯合”，所謂“大聯合”者即商會；“教育之中更為大教育”，“所謂大教育者何，政學是已。”政學即關於一國之國體沿革和經國之務，也即“西國學校所教致用之學，如群學、國家學、行政學、資生學、財政學、哲學各事”。

梁啟超將“聯合”與“教育”看做培植國人愛國心的起點，同時也沿著這兩個方面展開其思想活動。先後發表的《商會議》、《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論商業會議所之益》，都是強調海外商人要聯合合群及其對於國家富強的意義，這一方面可以看做是他此前的“合群”思想的延續，另一方面大概也含有在海外僑商中進行政治動員的現實動機。在“教育”方面，一是開辦學校，如橫濱的大同學校；二是經營報刊，傳播政學。《清議報》第11冊上宣佈改變編輯方針，“特取東西文各書報中言政治學、理財學者，擷其精華，每期登錄數叶，因政治等學為立國之本原，中國向來言西學者僅言藝術及事蹟之粗跡而於此等實用宏大之學絕無所知，風氣不開，實由於此。”即是對政學重視的信號。^⑨

作為改變編輯方針的表現，同一冊上就開設了“政治學譚”專欄，並開始刊登伯倫知理的《國家論》。狹間直樹認為“這是梁啟超與康有為的世界主義拉開距離，豎起國家主義旗幟的標識”。這一觀點相當準確地揭示了梁啟超在《清議報》上譯刊《國家論》這一舉動的思想意義，可以說伯倫知理的學說給予梁啟超的刺激主要是針對他之前所奉行的康有為的大同學說。不過，梁啟超在這篇譯稿中並沒有表明他的國家主義立場，真正明確表達其立場的是《清議報》第33冊《飲冰室自由書·答客難》一文，對於有人詰難其本來祖述春秋無義戰和墨子非攻，“今之言何其不類也”，梁啟超回答說：“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⑩表明梁啟超公開宣佈其已放棄了追隨康有為所講的大同理想，而改為信仰國家主義。而事實上梁啟超大約在1899年5月就已經放棄了大同理想，其表現就是在《清議報》第14冊之後突然停止連載譚嗣同的《仁學》，這是因為《仁學》被看做是闡明康有為大同思想之作，“《仁學》之政論，歸於世界主義”。^⑪

國家主義實際上具有兩個側面，一是對外關係，即如何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二是關於國家內部關係，主要涉及政府與國民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往的研究成果在論述梁啟超這一時期的思想時，多將這兩個方面混為一談，而且主要是在後一方面的意義上來進行分析，如此就不能全面地把握梁啟超國家論的雙重層次，尤其是忽略了國家主義是在與大同學說（即梁啟超所謂的“世界主義”）相對立意義上的涵義。我們應該看到，梁啟超這時首先擔心的是國人缺乏國家意識，不能團結合群以抵抗西方列強的瓜分危機，因而一方面指出國人缺乏愛國心，另一方面又大談“瓜分危言”^⑫。在《愛國心》一文中，梁啟超不但將愛國心與國家強弱危亡聯繫起來，警醒國人要樹立愛國心，並且分析了國人缺乏愛國心的原因：一是“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故不以國視之。既無別國之對待，也就不自知其為國，而稱禹域或天下；二是“中國自秦漢以來，數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隸視其民，民之自居奴隸……而不自居於子弟，視國事如胡越”。後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將國人愛國心之薄弱視作中國積弱之最大根源。“推究其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發源於理想之誤者，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⑬但他並不認同泰西和日本人動輒說中國人“無愛國之性質”的說法，“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故謂其愛國之

性質隱而未發則可，謂其無愛國之性質則不可。”這即便是出於宣傳策略的說辭，也可以反映梁啟超對於激發和培植國人的愛國心是抱以樂觀進取的態度。那麼究竟要培養國人怎樣的愛國心，所愛之國該是怎樣的國，又該如何去培養？這些問題其實也包含在梁啟超這一時期的國家論中。

二、“國”的概念及其初步展開

梁啟超改奉國家主義，呼喚國人“愛國心”，那麼他所說的“國”究竟是什麼概念呢？我們有必要沿著他的發言次序對其有關“國”的涵義加以梳理與歸納，茲列舉梁啟超在1899~1900年間有關“國”的論述如下：

“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凡國之起，未有不起於家族者……故西人以國為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中國則不然，有國者只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⑭

“國也者，積民而成者也，積府州郡縣鄉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盡其職效其力，則膚革充盈，人道乃備。”^⑮

“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愛國必自興民權始。”

“西人以國為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中國以國為一人之私產。……故彼其民為公益公利自為鬥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鬥也。”“英法德美諸邦，其進於今日之治者，……不過以一國之人辦一國之事，不以國為君相之私產，而以為國民之公器，如斯而已。”^⑯

“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捨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有國家之競爭，有國民之競爭。國家競爭者，國君糜爛其民以與他國爭者也；國民競爭者，一國之人各自為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爭者也。”^⑰

“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首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室其生機者也。”“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⑱

通過檢閱梁啟超流亡日本後至庚子勤王失敗這段時間裡的著述言論，可知他對於“國”的認識以“民”為核心，強調國家的本質就在於國民，國民國家才是完全成立之國。這樣的國家觀念明顯是受伯倫知理的《國家學》影響，且看《清議報》上刊載的《國家論》第二章第一節中的一段文字：

今之文明諸邦，皆民人國家也。民人國家者，凡國中之民，合成一體，自斷其理，自宣其意，自行其政之謂也。故民人之意志，即國家之精神。憲法為其體，官府議院為其四支五官，以成一活動體之國家也。由是觀之，國家之要旨，可一言以蔽之，曰無人民則無真國家。^⑩

此外，關於國家起於家族、類似人體官支之類的論述也可見之於《國家論》，表明伯倫知理關於國家起源以及國家有機體的理論對梁啟超有了一定的影響。當然，梁啟超亦不乏根據伯倫知理國家學“原理”來觀照中國的引申發揮之論。當中最主要的就是認為當時的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立之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有國者只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室其生機者也。”在梁啟超看來，中國當務之急是建立國民國家，而國民國家的建立當非一蹴而就，其中最主要的任務是如何破除數千年以來在中國國體和王朝政體下所形成的國人奴性，進而造就真正的國民。由此思想邏輯來看，梁啟超的國家主義與他在這一時期所提倡的自由民權思想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具有緊密的連鎖關係。《清議報》第25~33冊“飲冰室自由書”欄中所發表的一系列文字，即是梁啟超基於“國”的概念而對民權與自由所展開的初步論述，為後來寫作《新民說》之序篇。

梁啟超認為政府壓制民權是政府之罪，而“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⑪因此，在“自由書”的系列文字中，就特別強調國人自求自由與民權的責任。在《放棄自由之罪》中，引用西儒之言說：“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在《國權與民權》中又說：“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甚至於因為覺得中國的改革與進步過於艱難而贊同採取“破壞主義”。“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⑫其後在《呵旁觀者文》和《少年中國說》中也一再強調國人對於國家的責任，“一國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而“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並且與康有為辨自由之義：“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籍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屢引法國大革命為鑒。法國革命之慘，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惡之尤甚。……雖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國也。中國與法國民情最相反，法國之民最好動，無一時而能靜；中國之民最好靜，經千年而不動。故路梭諸賢之論，施之於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之於中國，適為興治之機；如參桂之藥，投諸病熱者，則增其劇，而投諸體虛者，則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⑬

這樣激進的態度被很多學者看做是與伯倫知理的國家論相對立，因而覺得此時的梁啟超似乎患有“思想分裂症”或者是放棄了國家主義。但是伯倫知理的國家論並非籠統的一概批評盧梭的民約論，梁啟超也承認，“路騷之說，雖妄謬如是之甚，然間亦有合真理者。其言曰：國家不啻逼於民性不可已之勢而成也。又曰：人類自由之意志，實佔國家樞要之地，以立法行政。路騷此言，可謂砂中之金。”可見在建國問題上，伯倫知理並不排斥自由，甚至認為“國家賴民人之自由而生息，民人以共同觀念建立國家，相合相助，而居其中以為之主”。^⑭盧梭的民約論在近代政治學著作中多被作為國家起源說之一種而遭到歷史學派的批評，對此，梁啟超通過日本知識界

肯定是瞭解的，而他之所以說要“獨尊法國主義者”，實際上是把它作為針對中國特殊情況而加以活用的一種手段而已，這在《破壞主義》和寫給康有為的信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而諸多學者之所以把盧梭與伯倫知理對立起來思考，恐怕是受1903年梁啟超自美洲回到日本後褒伯倫知理和貶盧梭的言論影響有關，可是在1899~1901之間卻沒有見到梁啟超在這方面的任何言論。在我看來，前後不同時期，梁啟超發言的語境不同，針對的問題也發生了變化，梁啟超對於兩人學說的適用與理解肯定也會有變化。

對於梁啟超來說，建國（指國民國家）問題雖然急迫，但也只是起點與基礎，而國家到底採用什麼樣的國體與政體，也是他開始思考的問題。1899年4月《清議報》第12、13冊上發表的《各國憲法異同論》大體上屬於資料彙編性質，重在介紹立憲政體各國的憲法有關政體的規定。而之後於《清議報》第17、26冊上刊登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則是依據國體與政體概念，通過比較中、歐數千年之歷史，探討兩方國體之異同，得出中國民權落後於歐洲的原因在於“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的結論。不過，有關政體與國體的問題尚不構成梁啟超這一階段國家論的主體，只是有資料顯示他比較傾向於英國的公利主義和立憲政體。這種傾向可能與梁啟超與進步黨的大隈重信、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等來往有關，受到明治末期以浮田和民、高田早苗等為代表的立憲主義運動影響。

總之，分析梁啟超這一時期的國家論，宜將其建國論與政體論分開來看，這樣才能看出他的國家思想的多面性，而不至於將伯倫知理和盧梭標籤化，進而對梁啟超的思想只作非此即彼的線性判斷。

三、帝國主義論與新民說

庚子勤王事敗後，梁啟超應澳洲保皇會之邀，居澳半年，辛丑四月復至日本。三月至五月，於《清議報》發表《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首先指出國人愛國心薄弱為中國積弱的最大根源，接著批評國人的劣根性（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和統治者的“政術”（馴之之術、誣之之術、役之之術、監之之術），最後將近因歸之於滿清入主中原二百多年中幾次大的失策統治，中心思想還是延續他此前“國”的概念，就是將“國”等同於國民而非朝廷與奴隸。^②此文實為梁啟超居澳期間擬作《中國近十年史論》全16章的第一章，據《澳洲華僑史》所載其他未完各章目錄，可知梁啟超當時是想將此前近十年的中國政治史做一總結，不僅探討中國積弱的前因後果，也思考“中國起衰策”（第十六章標題）。^③當中也一定包含了他對勤王事敗以及義和團運動的思考與總結，預示著梁啟超將要開創新的視野，繼續探索救國之道，惟從所發表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來看，還缺乏新的理論刺激，這可能與他居澳期間不能接觸東文資料有關。

在這種情況下，就國家的進化序列來看，梁啟超仍以西方民族國家作為最高層次，而以中國作為過渡時代的大國^④，故其目標當致力於國民國家的建立。然而八國聯軍的入侵以及隨後列強為爭奪中國權益而進行的外交活動和提出的對華政策，如“保全支那”論、門戶開放政策，對梁啟超產生了新的刺激，引起他的警覺，於是作《滅國新法論》，揭露列強不同於以往的侵略手段。^⑤這些新的侵略手段其實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對外擴張的表現形式。梁啟超雖然敏感於現實國際政治的新變化，並且也總結出它的若干特徵，但是還不能從政治理論上進行深刻說明。反過來說，這時若一旦接觸到這方面的理論，肯定會引發他的共鳴，激發他的思考力度，事實上，不久他就讀到了有關“帝國主義”的論著。

1901年10月《清議報》第94、95冊上發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表明梁啟超已經閱讀了有關帝國主義的論說。這篇論文大體上是由兩部分理論來源構成，第一部分是伯倫知理的國家學，梁啟超於文中已明言之；第二部分為有關民族帝國主義理論，梁啟超雖未指明其出處，但是據他在此之後發表的《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中稱，“篇中取材多本於美人靈綬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⑧，可知也當來自這些書中。^⑨帝國主義論延長了歐洲國家思想的發展序列，梁啟超根據上述兩部分國家理論來源，將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作了圖示，並列表對比歐洲新舊國家思想與中國舊思想，而將重心放在“現在”階段，指出亞洲處在“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而歐洲則進入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時代，“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臺也”。梁啟超還指出這兩大主義的原動力不同：民族主義來自平權派，“盧梭之徒為民約論者代表之”；民族帝國主義的原動力源於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為進化論者代表之”。“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略一變而已，即對內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該文結尾一段，其中寫道：新帝國主義“以全國民為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頑鋼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欲以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⑩以人的成長階段來比喻國家的進化程度，亦見之於此前的《少年中國說》。雖然這一次所說的“成人”已由民族國家置換為民族帝國主義，但其背後的進化論邏輯依然如一。正是基於這一邏輯，梁啟超一方面大力鼓吹“國家主義”，一方面致力於塑造新國民之宣傳。二者之間的關係，恰如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所明確宣示的：“吾今欲極言新民為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於內治者，一曰關於外交者。”前者是說，內治腐敗無能，其根本的原因在於國民的文明程度低下；而後者則是針對民族帝國主義而言，“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捨新民末由。”^⑪

關於國家主義的鼓吹，我們不僅可以復按梁啟超當時於報刊上所發表的文字，也可以看看他自己的表白。從他所發表的文字來看，代表者如《論民族競爭之大勢》^⑫、《論國家思想》^⑬。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梁啟超指出，民族主義是製造近世國家的原動力，“由世界主義而變為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皆迫於事理之不得不然”。通過分論英德俄美四國的帝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營手段與殖民政略，他得出以下結論：“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在《論國家思想》中，梁啟超說：“有國家思想，能自佈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文中分析了中國人缺乏國家思想的原因在於，一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是

“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其中誤認國家為天下者又有二因，一由於地理，二由於學說。而“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者不過為一時之謬見，易為時變所去，“所最難變者，則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之弊，深中於人心也”。此外，梁啟超在這一時期還作了不少中外人物史傳，如《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等，皆為表彰愛國主義者。《新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等史論中也不乏對國家思想的發揮。“新史學”乃針對舊史學而言，梁啟超批評中國舊史學之弊有四，其中第一條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第二條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對堯舜的肯定是基於國家進化必經的階段。同樣，論及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將法家定位於國家主義，認為“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④。

而梁啟超的自我表白可見之於以下材料：在《南海康先生傳》中，梁啟超公開指出康有為的缺點是缺乏國家主義，而他則“專馳心於國家主義”。^⑤又在給康有為的信裡，就大同之說與國家主義有所辯駁：“……但見夫近日西人著述，言國家主義者，未有不借大同為襯筆、撇筆，蓋欲主張其本論，使之圓到，不能不論及也。大同之說，在中國固由先生精思獨闢，而在泰西實已久為陳言。”^⑥《三十自述》裡亦說：“一年以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⑦

於塑造新國民宣傳方面，以《新民說》為典型，故學術界對此多有研究，就其中的民權論與國家主義的關係，以狹間直樹先生的解讀較為筆者所認同。在他看來，“梁啟超的闡述以個人為出發點，以國家之優位為歸結。由於國家與新民並無矛盾，當他的國權和民權從‘國民’的觀點展開時就傾向於民權主義，從‘國家’的觀點展開時就傾向於國家主義，可以說有兩個軸心，正像橢圓有兩個焦點一樣。”^⑧不過，從其具體的論述過程來看，仍有可以商榷與發揮的餘地。比如，儘管梁啟超自稱他這時信奉國家主義，而實際上卻是要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作為其政治哲學的是歐洲18世紀的自由民權學說，並非是19世紀作為民族帝國主義哲學基礎的國家主義。如上文所引，梁啟超其實已經指出了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存在著不同的思想基礎，只是他在用詞上並非始終都注意嚴謹性。從用語來看，為了強調民族建國的意義，有時難免混用國家主義的表述，但是在邏輯上，梁啟超是基於進化論的原則來論述民族建國問題的，因此就其論述的主體來看，只能是援引作為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建立的那些思想武器——主要是英法的自由民權學說。又如，狹間先生雖然揭示了新民的目標是建立近代民族國家，梁啟超因此“將培養國家思想當做緊急任務而加以呼籲”，但是對於梁啟超來說，促使他在這個時段特別強調這一主題的時代背景是什麼呢？置身於日本，對他構成精神壓力與知識啟示的思想氛圍是什麼呢？對於這方面的情況，狹間先生沒有提到這一時期以早稻田大學為中心的立憲主義運動。這一運動中也包含了很多帝國主義成分，作為主張與推動“立憲帝國主義”的中堅人物之一的高田早苗為此發表了很多言論。^⑨簡而言之，就是主張“對外實行帝國主義，對內實行立憲主義應當成為超越黨派的日本國民之大主義大方針”。^⑩又如，關於梁啟超的國家與國民概念的來源問題，狹間先生只強調伯倫知理的影響，說梁啟超“是把伯倫知理的學說當成中國所需要的處方來接受的”。^⑪然而，伯倫知理關於“國民”與“族民”的解說，在當時的日本大體上已經成為常識性的知識，在各種政治學概論性的書籍中都有類似的論述，甚且更為合理，比如高田早苗《國家學原理》的第三章以“國民的意義”為題，對於國家、國民、民族、社會這些概念都做了清晰的界說。因此，很難肯定的說梁啟超的國家與國民的概念具體來自於哪一個文本，“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文明競爭已達

於‘民族帝國主義’階段這樣一種認識，並非來自芮恩施和基丁格斯等特定時論家的特定論著，而是通過改寫的方式已經結合於明治日本‘文明’認識的延長線上，並已形成為一般概念。”^④

四、以開明專制為立憲之預備

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其宗旨表明要與現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而致力於思想文化啟蒙，務以養成國人“國家思想”，通過改造國民性，為建立民族國家培植國民基礎。^⑤這樣的態度其實也源於對於戊戌以來歷次政治變革的失望和對清政府改革決心和能力的懷疑。

梁啟超的啟蒙實踐收到了明顯效果，《新民叢報》的發行量和讀者人數相當可觀^⑥，影響廣泛，他的好友黃遵憲當時就告訴他：“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剽襲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變矣；實事吾不知，議論既大變矣。”^⑦然而影響卻是一把雙刃劍，“新民說”在實踐思想啟蒙的同時，也引發了暴力革命和國家分裂的潛在之憂。黃遵憲雖然讚賞梁啟超關於權利、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等論述為自己所欲言而未能言的“精思偉論”，但卻擔憂梁啟超有關“破壞主義”的宣傳只會導致政治動亂與社會崩壞：“胥天下皆懵懵無知，碌碌無能之輩而已。以如此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裁者幾希。”^⑧這是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黃遵憲寫給梁啟超的一封長信中所談到的。此前的五月間，黃遵憲亦有一信致梁啟超，其中談到中國政治現狀及將來的政體問題。^⑨

黃遵憲的意見是否對梁啟超產生了思想影響甚或被基本接受^⑩，雖然不能直接證明，但是1903年梁啟超訪美歸來之後的言論變化，與黃遵憲的意見似出一轍。

學術界一般認為梁啟超的政治學說由自由主義向國家主義的徹底轉變，是他在1903年2月20日至11月11日旅美期間完成的。從那時起，他便開始有條理地抨擊他曾維護過的自由主義學說，特別是盧梭的思想。在此之前，他認為盧梭思想可以成為中國更新國家的基礎。之後，他不僅宣佈接受伯倫知理的政治觀，而且重申對盧梭的批判。作為其思想轉變的明顯標誌就是刊登於《新民叢報》第38·39號合刊上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其中包括對盧梭的批判。而有關對共和制度的批判，不僅重複了此前《清議報》上發表的《國家論》刪去的伯倫知理對此問題的論述，還增加了早稻田大學剛剛翻譯出版的波倫哈克《國家論》中的一些論點。^⑪但是，以訪美為界作為梁啟超思想轉折的標誌也被一些學者認為不太合適。如狹間直樹就指出，梁啟超“是把學說理論按時間序列加以對應的，對盧梭的批判是在承認盧梭的歷史意義的基礎上進行的”。另外，《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也明確指出，民約論受到政府——而非國家——成立的原理的約束。^⑫土屋英雄也認為在梁氏思想中，“盧梭的民約論不是作為國家的，而是建立政府的原理得到了安排”。^⑬川尻文彥則指出，《新民叢報》第32號上刊載的署名為“力人”（梁啟超的筆名）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其實是在訪美之前寫的，對伯倫知理的理解並無太大差異，看不出訪美前後出現太大的變化。^⑭但是梁啟超這時之所以要高調認同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學說，同時卻批評盧梭的民約論，顯然另有用意。對此，如果聯繫《新民說》的結構變化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就在開始刊登《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的《新民叢報》第38·39合刊號上，也出現了《新民說》第18節《論私德》（分3回連載），這顯示《新民叢報》宗旨所標榜的“德育方針”

和“政學理論”同時開始轉變方向。關於《論私德》之後梁啟超立場的轉變，狹間直樹有很深刻的分析，他認為梁啟超訪美回國後由“公德”轉而“論私德”，其原因在於梁啟超認為確立公德所需要的國民教育現在無法實施，而破壞主義的道德觀卻非常盛行，結果是源於歐洲的“自由、平等、權利、破壞”等等“公德”學說反而墮落為將自己的胡作非為合理化的口頭禪。於是他停止宣傳公德，轉而提倡“王學”作為私德的典範。然而，大約在兩年之後，他又拋棄了這一立場，以“開明專制論”取代“新民說”，他所論述的不再是始自底層的新民的養成，而是由權力發動的改造與革新。導致這一戲劇性變化的原因在於梁啟超同“出洋考察憲政大臣”的接觸並為後者代擬奏摺。^③由此看來，梁啟超回國後之所以要高調批評盧梭的民約論，主要是針對從1903年後蓬勃興起的排滿革命運動，希望消除盧梭思想的影響，當然也包括此前黃遵憲對他的委婉批評所指向的事實，同時也是向政府方面表明合作的態度。

但是這種轉變對於梁啟超的建國論意味著什麼呢？通過分析梁啟超與革命派的論戰，可以肯定梁啟超立志於建立民族國民國家的理想與立場並未改變。梁啟超認為，救國為當時中國之急務，救國必須以政治革命為唯一手段，所謂“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而“種族革命者，民間以武力而顛覆異族的中央政府之謂也”，與立憲無一毫之因果關係，反而可能為列強提供干涉與瓜分中國的可趁之機。能否立憲的關鍵在於國民要求與否，種族不同必非不能立憲的原因。相對於中國與外國之間的競爭，滿漢之爭只是內競，滿漢利益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同病於惡政府，同樣面臨亡國的處境，一旦中國亡了，無滿亦無漢。內競宜以調和方式對待，不應爆發為種族革命。他甚至認為中國不存在所謂“種族問題”，因為“滿洲人實已同化於漢人，有構成一混同民族之資格”。因此，所謂“種族革命”乃屬無的放矢，實無必要。^④其實，梁啟超早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就批評滿清入主中原之初開始推行的“嚴滿漢之界”政策，“未暇為中國國民謀進步”。可見其中所蘊含的國民國家的理想直到論戰之時依然延續，他甚至還主張中國未來也要實行“民族帝國主義”。^⑤

建立民族國民國家乃至將來實行民族帝國主義的理想目標雖然未變，但是路徑與手段則做了調整。在《新民叢報》的前期，梁啟超表明是要與現實政治包括滿清政府保持一段距離，致力於對國民進行德育教化和政學啟蒙。這樣的路徑雖然觸及根本，但是速效則未必明顯，梁啟超也意識到“此其功雖非旦夕可就”，惟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不為蓄，終身不得”。可是，“論公德”不但未能收到預想的效果，反而為排滿革命風潮火上澆油，“論私德”效果如何亦尚待觀望，尤其要命的是“破壞則無需道德”的破壞主義道德觀非常盛行，而且帝國主義入侵的勢力也日趨嚴重。面對這種狀況，“新民”這條路徑是否還能走得下去，是梁啟超倍感困惑的問題。於是中間經歷了救國的希望在於“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的思考^⑥，而最終拋出了“開明專制”論。梁啟超認為“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若求共和“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或雖有共和之名而有民主專制之實。中國今日不但萬不能行共和立憲，而且尚未能行君主立憲，中國今日當以開明專制為立憲制之預備。^⑦梁啟超非議革命共和以及主張開明專制的法理依據，即其在致蔣觀雲函中所說“弟所謂開明專制，實則祖述寬克彥氏之說”^⑧。而汪精衛在駁斥梁啟超的觀點時，則將波倫哈克（Conrad Bornhak）的學說作為梁啟超“唯一之論據”。^⑨也有學者指出，梁啟超所說的“專制”是一個理論性概念，指的是一種“法的支配”的政體，其目標是使國人獲得立憲國民的資格，其立場不能說是退步的。^⑩新近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關照到“開明專制論”與1907年秋梁啟超提出的“國會速開論”的內在關係。按照梁啟超的實

際想法，國會速開絕不是目的，而是作為阻滯清廷高度集權的內閣制建立和欽定憲法制定的一種手段，以便在開明專制下來充實立憲預備，使政治制度與人民的程度相適應，相互促進。因此，“國會速開論”不但不是對“開明專制論”的否定，反而是“開明專制論”中的立憲觀的歸結。^④總之，梁啟超此時實際上已經改變了由新民而建國的構想，轉而寄希望於利用現實的政治權力來推動立憲制的實現，建立起近代民族國民國家。

結 論

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因為交往一批興亞論者，加上接觸到成為日本官僚性國家建設之“體”的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先前所懷抱的大同理想（“世界主義”）乃讓渡於“國家主義”。與此同時，在梁啟超的思想觀念中形成了一種粗淺的“國”的概念，它將國家實質等同於國民，傳統的儒家民本觀念在其中當然發揮了潛在的接引作用，但也注入了西方的權利自由觀念，並且借用生物有機體的形象比喻來看待國家的進化史。基於這樣的概念，梁啟超判斷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國人普遍缺乏愛國心，缺乏作為國民的主體意識。之所以落後於西方還不能稱其為國，原因在於中國的地理、歷史以及王朝的以一家私天下的專制統治。面對優勝劣敗的國際競爭局面，惟有儘快建立民族國民國家，他把希望寄託在國民覺醒，主動爭取自由與民權，而彼時政體論尚不是他關心的重點。

在勤王事敗之前，梁啟超對於建立民族國家尚具樂觀態度。而庚子事變後，一方面更深體會到國民的劣根性，一方面目睹國事紛擾，列強的“滅國新法”，加上受在日本開始流行的帝國主義論的刺激，梁啟超對於國家前途深感悲觀，更加意識到建立民族國民國家的迫切性，而以培養公德、塑造“新民”作為著手的辦法。旋因排滿革命運動興起，梁啟超通過《新民叢報》所傳播的“公德”思想，反而助長了種族革命思想，鑒於擔心多民族的共同體會因此而分崩離析，更不利於建立民族國民國家，乃絕然終止“公德”宣傳，轉而論“私德”，欲借王學以維新；於政學上，援引伯倫知理、波倫哈克以及笈克彥等人的學說，主張自上而下，行“開明專制”，以為建立立憲國家之預備。

縱觀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到辛亥革命的思想歷程，可見在其國家思想中建國論一以貫之，始終以建立近代民族國民國家乃至將來發展為民族帝國主義作為理想目標，而政府論則並非如此連貫，因時而變，頗有實用主義色彩，仍然不免傳統士大夫那種心憂天下的潛在情懷。

①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②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6月三版，第119、163頁；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9頁。

③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253~254頁。

④⑤川尻文彥：《梁啟超的政治學——以明治日本的

國家學和伯倫知理的受容為中心》，洛陽：《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⑤李春馥：《論梁啟超國家主義觀點及其轉變過程》，北京：《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⑥梁啟超：《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二，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186頁。

⑦田村紀雄、陳立新：《梁啟超の日本亡命直後の“受け皿”》，東京：《東京經濟大學人文自然科學論集》，第118號，2004年12月。關於梁啟超與陸羯南的關係，參看王明偉：《近代日本國民主義與梁啟

超國民國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⑧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9頁。

⑨《本報改定章程告白》，橫濱：《清議報》，第11冊，1899年4月10日。

⑩《飲冰室自由書·答客難》，橫濱：《清議報》，第33冊，1899年12月23日。

⑪狹間直樹：《梁啟超筆下的譚嗣同》，濟南：《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⑫1899年5至8月梁啟超在《清議報》第15~17、23冊上發表《瓜分危言》（署名“哀時客”），全面論述甲午戰前以來列強對中國的有形瓜分與無形瓜分之事蹟及其近因。

⑬《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2~42頁。

⑭⑯⑰《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9、70頁；第73~75頁；第76頁。

⑱《商會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頁。

⑲《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橫濱：《清議報》，第30冊，1899年10月15日。

⑳《少年中國說》，橫濱：《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10日。

㉑橫濱：《清議報》第15冊，1899年5月20日。

㉒《破壞主義》，《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25~26頁。

㉓⑳⑳㉑⑳⑳⑳⑳⑳⑳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頁；第285~286頁；第271頁；第306頁；第302頁；第366頁。

㉔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文集〉集外文》，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20~1221頁。

㉕《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2~42頁。原發表於4月29日至7月6日《清議報》第77~84冊。稍早，《清議報》第73冊、第74冊“本館論說”欄中連載的《論支那人國家思想之弱點》，說中國人“不知有國”，推原其因，一由於地理上周邊皆撮爾小邦，二由於歷史上長期的大一統。並指出中國人“歷來視國家為君主一家之產業”，“君主即國家”，“容易降服”，缺乏獨立性質。這

些觀點亦見之於梁啟超其他文章中，故從內容來看，似可斷定出自梁氏手筆。

㉖島田虔次等編譯：《梁啟超年譜長編》，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第409頁。

㉗在6月26日《清議報》第83冊上刊登的《過渡時代論》中，梁啟超說：“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7頁）。對照《少年中國說》一文，可知他是以國民國家作為標準而有此論斷的。

㉘《滅國新法論》，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2~47頁。

㉙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頁。關於高田早苗譯《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與浮田和民的倫理帝國主義思想對梁啟超的影響，日本學者森時彥、石川禎浩和中國學者鄭匡民等先後都有論說，參見《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第114~117、232~233頁；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第183~200頁。

㉚不過就《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而言，也有可能直接受高田早苗的《國家學原理》啟發。高田早苗的《國家學原理》有多種版本，其中一種漢譯本共16章，其中第四章標題為“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這一章是之前一些版本所沒有的，很可能作者是在閱讀了芮恩施（P. S. Reinsch）的《十九世紀末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New York, 1900）一書之後而增加的。

㉛《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22頁。

㉜《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第1~5頁。

㉝發表於1902年2~4月《新民叢報》第2~5號，同年5月廣智書局就出版了單行本，書名為“現今世界大勢論”，署“飲冰室主人譯著”，增加了梁啟超自敘，並將《滅國新法論》收為附錄。

㉞為《新民說》第六節，發表於1902年3月24日《新民叢報》第4號。

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21頁。《新民叢報》曾發起“管子傳”徵文，亦可見梁啟超對於管子的重視，乃是基

於提倡國家思想的需要。關於梁啟超與管子的思想關係，可參看李曉東：《近代中國の立憲構想——嚴復·楊度·梁啟超と明治啓蒙思想》（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5年），第141頁。

③⑤《南海康先生傳》，橫濱：《清議報》，第100號，1901年12月21日。

③⑧④①⑤③⑤狹間直樹：《〈新說〉略論》，見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6頁；第78頁；第78頁；第86～92頁。

③⑨阿部恒久：《高田早苗の代議士活動》，見《高田早苗の総合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大學史資料センター，2002年，第260～266頁。

④⑩高田早苗：《帝國主義を採用するの得失如何》，東京：《太陽》，第8卷第7號，1902年6月。

④②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見《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第116頁。

④③橫濱：《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

④④參看周佳榮：《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與新民叢報》，香港：中華書局，2005年，第10～21頁。

④⑦《東海公來簡》（壬寅五月），橫濱：《新民叢報》，第13號，1902年8月4日。

④⑧關於黃遵憲對梁啟超的思想影響，詳見張朋園：《黃遵憲的政治思想及其對梁啟超的影響》，《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7～39頁。

④⑨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野村浩一也認為這篇文章標誌著梁啟超與盧梭主義式的共和主義訣別，而轉變為伯倫知理的“國家學”（野村浩一：《近代中國の政

治と思想》，東京：築摩書房，1964年，第176～177頁）。鄭匡民亦持同樣看法，見氏著《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第258～260頁。

⑤①土屋英雄：《梁啟超の“西洋”攝取與權利——自由論》，見《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第149～154頁。

⑤④梁啟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橫濱：《新民叢報》，第76號，1906年3月9日；《雜答某報》，橫濱：《新民叢報》，第85號，1906年8月20日；第86號，1906年9月3日。

⑤⑤⑤⑨具體論述參看孫宏雲：《汪精衛·梁啟超“革命”論戰的政治學背景》，北京：《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⑤⑥《論政治能力》，《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第156頁。有關梁啟超使用“中等社會”概念問題迄未解決，可參見張朋園在《梁啟超的精英主義和議會政治》一文中的相關論述，見氏著《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32～334頁。

⑤⑦《開明專制論》，橫濱：《新民叢報》，第75號，1906年2月23日。

⑥⑩高柳信夫：《梁啟超〈開明專制論〉をめぐって》，東京：《言語・文化・社會》，第1號，2003年3月。

⑥①藤井隆：《政體論から〈開明專制論〉を読む》，広島：《修道法學》，34卷2號，2012年2月。

作者簡介：孫宏雲，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 510275

[責任編輯 陳志雄]